

文化工具箱：一种文化解释的新范式

□ 西儒

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是假设文化通过定义人们的终极目标来影响他们的行动。从这一假设出发，价值观成为文化的关键要素。然而，这一范式虽然能够提供一种以文化来解释行动的路径，但是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为了寻找更好的解释路径，安·斯威德勒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即文化是通过塑造人们的手段来影响行动的。本文将在介绍两种文化解释范式的基础上对其做一个简单的评价与反思。

一、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

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是假设文化通过定义人们的终极目标来影响他们的行动。这一范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著名的“扳道工”隐喻中指出：“直接支配人的行为的并非理念，而是物质型利益和理念型利益。不过，由观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常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行为沿着哪条利益驱动的轨道发生。”也就是说，虽然利益是人类行动的最终驱动力，但是观念却能决定人们的目标及相应的手段，从而为人们的利益驱动力设置一个轨道。这里的“观念”，用斯威德勒的话来说，是“由制度利益、政治变迁以及实用主义驱动力等塑造的复杂的历史建构

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继承并发展了韦伯的观点，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单位行动”，它是指人们在某个特定情境中带着自己的目标行动的，在这个情境中既有人们无法控制的条件也有能够为人们利用的手段，而人们的目标及相应手段都受到价值和规范的限制。其中，价值观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是因为，价值观作为一种主观偏好能够为人们从众多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提供一种标准。而人们价值观的来源，往往就是他们所归属的社会中存在的文化。也就是说，帕森斯的意思是，文化提供了价值观，而价值观能够对人们的目标作出规范，从而使行动具有特定的方向。简而言之，文化通过价值观对目标的定义来影响行动。

二、文化解释的新范式

安·斯威德勒提出了一种文化解释的新范式，与传统范式对价值观的强调不同，这一范式假设文化是通过划定人们手段选择的范围来影响行动的，斯威德勒形象地将其称为“文化工具箱”。她指出，文化是“收纳象征符号、故事、仪式、世界观的一个‘工具箱’”，“人们在不同情况下可以从中取出不同工具来解决各种问题”。在这样一种文化观之下，人们从价值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变成了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文化的存在是为行动者提供一些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值得强调的是，文化工具箱虽然假定了人们是一位理性的文化利用者，但是依然与理性行动论中的“理性人”存在差异。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文化工具箱中的行动者是嵌入在文化之中的，他们对手段的选择深受文化的影响；但是理性行动论中的“理性人”是脱嵌于文化的，他们行动的原则是自利。其次，理性行动论中的行动依然局限在“单位行动”之中，而文化工具箱将行动视为一种“行动链”。“单位行动”意味着理性行动论将人们的行动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单位”，并认为人们在每次行动前都会为了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而对手段做出一番抉择；可在文化工具箱看来，人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单位”而是前后相连的“链条”，虽然人们在这一“链条”之上会不断地使用“策略”，但是这些“策略”往往不是临时思考的结果而是“预制”出来的。

三、评价与反思

斯威德勒之所以提出文化工具箱，是因为文化解释的传统范式存在缺陷。她对此做了两点说明：第一，不同的群体可能存在共同的目标，但是文化对他们行动模式的影响却可能是迥异的，传统的文化解释范式对此无能为力，而文化

工具箱却能对此作出很好的解答。在文化工具箱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文化影响的不是人们的目标而是他们的手段。比如说，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价值观，但是社会底层相比于社会精英却更难取得优异的成绩。这种现象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恰恰相反，他们都非常渴望取得优异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文化手段”。正如斯威德勒所说：“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在自己对既有的技能、生活方式、常识等都不熟悉的世界里获得成功。一个人只有在他已经具备这些文化要素的时候才可以更好地采取行动。”第二，斯威德勒指出，当某些观念消失之后，那些因这些观念而产生的行动风格或伦理依然具有持久性，这同样意味着文化影响的是行动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供奉菩萨或财神，这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具有真正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只能想到用这种手段来实现自身的某些目的。可以看到，文化工具箱在某些方面具有非常出色的解释力。不仅如此，通过将“理性人”纳入理论之中，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结构与实践的紧张：人们是受着文化对手段的制约，但是也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或者更换乃至放弃已经失效的手段。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在多元化与全球化浪潮交织的当今世界，民族认同和民族团结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民族集合体，其凝聚力是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哲学作为探索存在的本性、知识和价值等根本问题的学问，提供了一种深层次的解析工具。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不仅有助于理论上的深化，对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也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进行探讨，着重分析主体性原则、总体性观念和和实践性原则如何共同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

□ 莫业略

一、主体性原则

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具有实践性、客观性、历史性相统一一的特征，强调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改造世界所具有的意义。

中华民族全体成员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具体体现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共同记忆和诠释，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共同规划和憧憬。这种主体性的发挥，使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能够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自信和自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主体性原则揭示了各民族成员之间通过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内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认同和尊重这种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各民族群众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推动者。他们通过语言、艺术、节日等文化形式，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传说，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文化共同体。

在主体性原则指导下，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深刻认识到自身福祉与其他成员息息相关，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个体和地方利益，要求全体成员在面临挑战时团结一致，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二、总体性观念

总体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处所汲取的多重灵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隐含的概念，从根基处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形态与理论特征，构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

在总体性观念下，中华民族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不仅体现在各民族成员的地理共同生活上，更体现在各民族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上。各民族之间通过婚姻、语言、经济、文化等交流，形成了比单个民族更为丰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属性。

总体性观念揭示了各民族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在这个整体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不同少数民族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例如，彝族、苗族、白族都是贵州省大方县的重要成员，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跳花节、白族的团园节已经成为他们共同庆祝的节日，他们互相参与彼此的节日活动中，进行文化艺术表演，促进了文化的相互欣赏和交融。这种依存与促进关系，增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内聚力。

总体性观念还强调了各民族在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中的共同责任。面对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挑战时，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能够迅速集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这得益于总体性观念下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来自全国56个民族的救援队伍和志愿者携手并肩，共同抗灾救灾，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

三、实践性原则

实践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即所有理论都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实践性原则意味着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增进相互理解和认同。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实践性原则发挥了关键作用。跨民族的婚姻、教育交流项目、多民族参与的节日庆典等具体实践，展示了实践如何帮助各民族群众增进彼此的理解与认同。例如，汉族与藏族之间的婚姻不仅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还加深了双方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国家民委开展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教育交流，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优秀人才。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以及壮族三月三、彝族火把节等少数民族节日，成为多民族共同庆祝的时刻，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共同文化体验。

共享资源、技术交流、共同市场等方面的实际合作，展示了各民族生产生活的共同性如何促进经济的共同繁荣。例如，新疆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涉及多个民族的共同利益，通过合作开发和保护水资源，促进了当地各族群众的团结。农业技术在各族群众之间传播，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收入，也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联系。各族群众在市场上的交易活动，如西藏的藏药、云南的普洱茶等，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加深了各族群众彼此的了解和认同。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探究

□ 袁珍珍

随着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人才市场需求逐渐精细化、高端化，研究生学历成为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导致考研人数激增，竞争加剧。家庭环境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考研抉择，因此本文从家庭文化资本角度探讨家庭环境如何影响大学生的考研意愿，并为相关的考研决策提出理性建议。

一、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结果及其原因分析

（一）具体化家庭文化资本与考研意愿呈正相关

父母的阅读归于具体化家庭文化资本，父母的阅读时间对大学生考研意愿呈正相关。父母的阅读行为为孩子树立了学习榜样，使他们对学业和未来发展有更多憧憬，因此更愿意选择读研。此外，父母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频率也较为重要。孩子参与更多文化活动，能接触更多不同知识和经验，拓宽知识面，在考研时更得心应手。孩子与父母在学习上的频繁交流也意味着家庭学习氛围

好，对其学习有一定帮助，更易触发考研想法。

（二）客体化家庭文化资本与考研意愿呈正相关

家庭藏书量属于客体化家庭文化资本，藏书量往往与大学生考研意愿呈正相关。家庭藏书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家庭内部学习氛围的浓厚与否，积极的学习环境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进取心，促进他们向更高学历迈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藏书量相对较少的家庭中，也有部分学生展现出强烈的考研意愿。这一现象背后，或许透露出这些家庭文化底蕴的某种欠缺，促使学生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与成就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并借此契机实现自我提升与向上流动。因此，他们选择考研，不仅是为了个人成长与发展，更是希望改变整个家庭的状况。

（三）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与考研意愿呈正相关

制度化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是否选择考研有影响，其中父母最高学历与孩子考研意愿呈正相关。父母学历越

高，孩子考研的动机越强，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提供给孩子的教育资源相对越好，这会影响到子女的观念。另一方面，父母学历高也会为子女树立榜样，促使子女选择高学历来提升自己。

二、对相关考研决策的理性建议

（一）个人应该审视自身情况

不应神化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考研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即便家庭文化资本缺乏，也有大学生选择并成功考研。考研的关键在于内部动机和目标导向的努力。大学阶段，学业课程减少，自主学习增多，时间管理更具自主性。因此，大学生应做好时间规划和职业规划，坚定不移地追求目标。对于缺乏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来说，他们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正确看待家庭文化资本，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应努力弥补并将其转化为动力；而对于家庭文化资本相对丰富的学生来说，他们应该做的是戒骄戒躁，合理运用自身资源。

（二）家庭应该增强内部动力

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生考研意愿有较大影响，包括家庭阅读气氛、参与社会

新形势下加强国企纪检监察工作的策略

□ 罗钰清

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承载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和反腐败斗争的持续高压态势，加强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已成为保障国企健康可持续发展、深化国企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型等多重挑战，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重要性逐渐显现。一方面，党中央对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更高的要求，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国企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指明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国企内部治理结构、经营机制不断优化，也为纪检监察工作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监督效能提供广阔空间。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加强国企纪检监察工作的有效策略，以期构建更加高效、科学、系统的国企纪检监察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引导，助力国有企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行稳致远。

一、完善纪检工作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力

新形势下，国企纪检工作制度体系的构建需具备前瞻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在实际执行中能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确保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完善纪检工作制度体系需立足企业实际，深入剖析企业运营中的风险点和薄弱环节

，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涵盖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如财务管理、项目管理、物资采购、人事任免等关键环节，确保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监督标准与操作规范。制度之间还要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形成完整的监督链条，避免出现监督空白和漏洞。同时，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纪检工作要敢于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积极探索新的监督方式和手段，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确保制度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而不是仅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在强化制度执行力方面，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一方面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制度执行中的偏差和问题，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检查、巡视检查等方式来实现，确保制度执行到位、不走样。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从而起到警示作用，震慑潜在的违纪违法行为，并增强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遵规守纪意识。

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纪检监察工作效能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背景下，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纪检工作转型升级、提升效能的重要驱动力。国有企业纪检机构应积极拥抱现代科技，将其深度融合到纪检工作的各个环节，以科技赋能监督，实现监督手段的创新与突破。通过构建纪检监察信息平台，将传统手工记录、纸质

档案等监督信息全面数字化，实现监督数据的集中存储、统一管理和智能分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为错误，使监督信息更加透明、更可追溯。在此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海量监督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能够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违法违规线索与规律，为精准监督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如远程视频监控、电子监察平台等，实现对关键岗位、重要环节的在线监督，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监督更加全面、深入、及时。通过在线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行为，防止问题扩大化、严重化，有效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行供应秩序和干部职工的合法权益。此外，运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建立风险预警模型，对监督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智能分析，提前发现并预警潜在的违法违规风险点，帮助纪检机构及时介入、快速处置，并通过数据分析为企业提供风险防控建议，帮助企业完善内部管理、堵塞制度漏洞。

三、加强纪检队伍建设，提升人才综合素质

在国有企业纪检工作中人才始终是核心资源，纪检队伍的整体素质直接关系到监督执纪的质量效果，纪检队伍建设需注重选优配强，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纪检干部队伍。在选拔纪检干部时，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注重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同时打破传统观念束缚，拓宽选人用人视野，不拘一格地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纪检队伍中来，通过优

化队伍结构，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纪检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专业要求高，需要纪检干部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要定期组织纪检干部参加业务培训、案例研讨等活动，深入学习和党的纪律处分条例、监察法等各项法律法规，掌握纪检监察工作的新政策、新要求、新方法。同时，鼓励纪检干部积极参与实践锻炼，通过参与案件查办、巡视巡察等工作，不断积累实战经验，提升业务能力。此外，纪检干部作为党的忠诚卫士和群众的贴心人，必须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和忠诚干净担当的职业操守。因此，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引导纪检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纪检干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做到忠诚履职、敢于担当。

四、结语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有效开展，需全体职工的共同参与，并对现有纪检工作制度体系进行完善，实现对各个环节的有效监管，为国有企业的稳定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而现代科技手段的融入，可实现对关键岗位与环节的实时监督，并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为企业经营决策与战略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此外，人才作为推进国企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应不断提升纪检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使其切实履行自身的责任使命。

（作者单位：贵州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